

政治经济学论丛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制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机械电子工业与外贸—经济增长纽带
从后进工业化看摆脱苏联模式制度变革
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危机与中国

变革性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

*China's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A Structural-Institutional Analysis*



卢荻/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政治经济学论丛

变革性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

卢 荻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北京

“ 十 五 ”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变革性经济增长

—— 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

*China's Transformational Growth
A Structural-Institutional Analysis*

卢 荻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金刚
责任校对：董蔚挺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变革性经济增长

卢 荻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新路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9.75 印张 240000 字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2594-1/F·1986 定价：19.2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 / 卢荻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7
(政治经济学论丛)
ISBN 7-5058-2594-1

I. 变… II. 卢… III. ①经济结构—研究—中国
②经济体制—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066 号

总 序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 100 多年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过渡，使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变化了的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难和攻击，创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和出版《政治经济学论丛》。《丛书》已被新闻出版署列入了“十五”国家重点图书。该丛

书的目的在于及时反映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作出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本丛书工作确立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经典性的表述。根据这一经典表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他有关阐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与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二、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与不断变化的条件相适应的历史性科学，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以历史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沃土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客观源泉，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生产集中的巨大发展和分散化趋势的并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金融资本的膨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周期的复杂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这些现象都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索和创立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理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途径。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论》及其手稿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地研究西方经济学，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抛弃其中的不科学因素，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30年代后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称作庸俗经济学，因为它是辩护的而不是客观的，它只在表面现象内兜圈子而不揭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有根据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 100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成就和意义。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些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一方面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其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成分，在学习和借鉴中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要准确和科学地辨别其中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意识形态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和不科学的东西。对于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批判性的借鉴，是获得科学成就的惟一途径。

四、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反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产生新的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克服这些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经典作家关于消灭商品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们揭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观点贯穿于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商品生产的这种批判尽管有自己的根据和意义，但总的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出现这一理论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是，他们误把机器生

产发展之初的某些现象当成了分工将要消灭的征兆，认为分工的消失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条件本身，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分工的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商品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判断。实践证明，在机器工业的条件下消除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类似的例子还有。明确承认到这一点，丝毫不会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反而会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前进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①

我们愿意在这个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林 岗

2000年11月18日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前言及致谢

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期望能够为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中国经济变革作出一个有所启发的分析、特别是着重分析重新融入世界市场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诱导与制约；二是要以此介入有关摆脱苏联模式经济制度变革的讨论。本书的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以上述两者为目的的著作，必须立足于经验分析，而非先验概念。因此，贯穿全书的论断，都是提炼自现实观察或所谓风格化现实，而非任何经济理论的所谓第一定理。

这样的分析及其论断，确实隐含着欠缺理论深度的危险，或至少会欠缺形式化经济理论所要求的明确性。但是，观诸相关的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学术研究文献，种种将已有的理论模型或概念不假深思地套用于现实、从而得出明显谬误政策建议的著作，早已是泛滥成灾，笔者因而深信本书的分析及论断可以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当然，强调从经验分析出发绝不是要否定理论，而是要强调理论的

变革性经济增长

限度，也即现实的开放性。理论的限度最能从比较中见出，本书的论述，就是从各种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理论的比较开始，并且将这种比较放置于现实世界范围经济变革的背景中加以检验和综合。而贯穿全书，强调国际视野对认识中国的发展与改革经验的重要性，其理由也正在此。显然，这种强调意味着，对正统的或流行的经济研究规范，即先验地假定了概念化的所谓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既是知识意义上的批判也是取态上的否定。

在此或许有必要提及个人取态对本书中的研究和论断的影响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少是就道德意义而言），笔者坚信市场机制对经济以至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其限度，因而其运作必须受到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严格制约和规范。尤其在生产领域即所有制问题上，笔者坚信，公有制就其潜质而言远较私有制更加符合人道主义，因为公有制使得劳动者有可能免于任由非人化的市场机制决定他们的生活状态以至长远命运。自不用说，从这种取态得出的对学术研究方法的结论，不应该是的分析地否定市场机制、或扬揭市场机制的经济理论，而是应该追求在分析层面上揭示公有制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就此而言，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一系列从现实观察中发展出来的关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后进发展等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现实中的利害相关者问责制度和民主企业制度的解说，为摆脱正统经济研究规范的束缚，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启示。而正如本书将详尽论述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经验，展现了创建超越市场经济逻辑、促进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的后进发展体制的丰富可能性。

本书的原型，是笔者1991~1994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写成的

博士论文，其中的部分关注课题和意念，更可以追溯至较早之前的认识和体验。笔者自大学本科后期开始认真观察现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毕业后的3年新闻记者生涯中更是以此为专职，上述的情感取态和研究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博士论文经过大幅度改写，于1997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当时笔者已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3年了，修改的过程也就打下了这个学术环境的印记，特别是得益于讲授硕士学位中国经济课和工业经济学过程中的探索。这本书的形成，又再经过了近四年的演化，在此期间陆续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是重新修改的基础；相对于博士论文以至1997年那本，本书已是面貌完全不同了，然而就最根本的层面而言，其关注课题和理论方法还是可以辨认得出的。希望这种循环往复中推进的学术道路能够坚持下去，更希望能够由此对于相关文献和现实关注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此应该向所有给我以支持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Malcolm Sawyer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在我的知识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新闻记者向学术研究人员过渡的关键阶段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他为我提供的研究员职位，更是这种过渡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毕竟，从事学术研究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奢侈品。Hugo Radice作为我的另一个导师，不仅在博士研究阶段给我以富有成效的指导，而且在随后的岁月中还给予种种无私的帮助，对此我只能铭感于心。本书的不少篇章或其原型论文都在亚非学院的研讨会中宣读过，由此获得来自众同事的善意而尖锐的批评或建议，下列诸位对我的帮助尤其不容省略不提：Anne Booth、Ben Fine、Christopher Howe、Costas Lapavitsas。剑桥大学的Peter Nolan对我的帮助同样必须在这里提及，他既是我1997年那本书的学术编辑，又是我谋求学术职位的推荐人，另

外还在不同阶段对我的研究路向给予热情的鼓励。在香港的朋友们，包括郑毓盛、陈文鸿、曾澍基等，始终是支持着我的研究探索的知识上和感情上的源泉，在此特别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帮助和友谊。张宇、孟捷等在北京的朋友们，对于本书的写作、出版多有鼓励和帮助，特此深表谢意。

正如上述，本书的相当部分章节，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中第2章综合了卢荻（1995）、Russell Smyth和卢荻（1999），第4章出自卢荻和陈文鸿（1998），第5章是与郑毓盛合写的，第6章出自卢荻（1999b），第8章出自卢荻（1999a），第9章出自卢荻（1994）、卢荻和Hugo Radice（1998）。感谢上述合作者以及各篇论文的出版者，允许我在本书中大幅引用以至干脆直接翻译了有关章节。

谨将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

卢 荻

2001年3月于伦敦

Abstract

Viewed from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China's recor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uld be regarded as rather unique. The country has survived well the three waves of catastrophes that beset the non-Western world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catastrophes, namely, are: first, the 'lost decades of development' in most parts of the Third World since the early 1980s, second, the total crisis in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viet bloc since the mid-1980s, and, finally,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isaster that engulfed most parts of East Asia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century. In this context, China's record is indeed unique, as well as paradoxical. For, the country's economic institutions have long been dismissed by the world orthodox establishment as by nature seriously deviating from the canonical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being akin to the crisis-causing factors of the three entities indicated above. How, then, has this

‘China paradox’ come about?

Talking about a ‘China paradox’, of course, would imply a challenge to the free market doctrines, and the orthodox establishment has been outspoken in rejecting it. A recurring proposition has it that China’s reformed institutions are a mix of market-conforming and market-supplanting elements, that its developmental achievements so far have been ascribable to the conforming elements whereas the accumulated problems ascribable to the supplanting elements, and that the problems have tended to outweigh the achievements as the country’s economic transition progressing from the allegedly easy phase to the difficult phase. It is clear that what underpins this proposition is the notion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omehow easy or normal – the notion of the so-called ‘natural path of development’.

At stake, however, is the source of demand that has sustained China’s industry-led economic growth. For, on the world scale, a major factor that has impeded late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omes precisely from demand-side constraints. One answer from the orthodox establishment is to emphasise China’s fast export expansion during this period. It is posited that China has followed the path of labour-intensiv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sation on the basis of its (endowment-determine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which is in turn posited to be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ural path of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with this view, however, is that it begs the question as to why such a presumably easy process has not occurred in the wider developing world. Nor – as will be documented in details in the book – can China’s export performance be easily explained by its ‘give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 all-important demand issue is to focu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starting point concerns a phenomenal development over the reform era that has been felt by virtually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 the 'consumption revolution', signified by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a wide range of consumer durables. These new, mass-production industries are typically characterised by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extensive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ages and high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Their explosive growth has thus been sustained by the existence of mass consumption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with it an even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urban areas. More generally,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based on the following nexus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consumption induces investment and thus overall demand expansion, thereby making it possible to absorb labour transfer from agriculture and to improv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via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A virtuous circl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between industry and the economy, has thus been at work. And the even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upon which the virtuous circle is based, has been, in turn, based on its specific political economy: the hitherto predominance of public ownership.

A central issue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concern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e observation is widely agreed: that the institutions of these firms have contradict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canonical market economy, especially of individualistic property rights. It is noted that China's enterprise reform has taken place in a context where various stake-holders of enterprises – local governments, workers, local communities, the banks and other business partners – have been involved to form a complex web of check-and-balance that govern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crucial question i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igidity-infused, long-term-oriented systemic feature of Chinese industri-